

Excellent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獎助出版

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

卓蘭生 著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D831.31
20101

地 日

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

卓南生 著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卓南生著．--初
版．--臺北市：巨流，2009．01
面；公分

ISBN 978-957-732-318-7(平裝)

1. 外交政策 2. 亞洲問題 3. 新聞評論 4.
日本

578.313

98000334

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

著者：卓南生

責任編輯：杜佳靜

發行人：楊曉華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政治大學集英樓2樓

電話：(02) 86610635

傳真：(02) 86615465

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07)2265267

傳真：(07)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78-957-732-318-7

2009年3月初版一刷

定價：4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出版緣起：為優質新聞與傑出記者而努力

蕭新煌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第二屆董事長）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是為了肯定和獎勵優秀新聞記者而成立的。

新聞記者此一專業的特殊性，在於一個記者不論隸屬於哪個媒體，或擅長哪種路線，都應該是秉持報導事實真相、維護社會公益的前提去進行每日的新聞工作。記者不該只是一種謀生的職業，它頂著民主社會第四權的冠冕，又揭櫫言論自由的崇高價值，再加上自主性極強的作業方式，讓記者行業經常充滿個人主義色彩，有時又帶一點英雄主義氣質。

相較於學者專注與知識體系對話，記者較了解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又由於經常站在重大事件的現場，他們必須目睹真相，見證歷史。在他們深入淺出、肌理生動的筆觸下，影響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或關鍵人物，乃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無怪乎在許多西方國家，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傳記，往往出自於有新聞工作背景者之手。

當前台灣的媒體環境實在令人很不滿意，不但有過於追逐市場、短視近利的經營心態，又缺少身為社會公器的組織自覺。一些優秀的新聞從業人員，在一開始有著滿腔熱情，卻囿於大環境，終究無法施展抱負，而挫折失望。

卓越新聞獎書系的出版計畫，就是為了鼓勵那些有志新聞專業，始終不放棄理想的傑出的資深記者，能將多年來在工作中的見聞和心得，經有系統的分析、整理後，以專書出現。這一書系目的一則是要彌補報紙、雜誌或因篇幅有限，或因市場考量，所造成的題材限制；二則強調對特具意義的議題能有論述、剖析的深度與廣度。

此外，我們也希望引介國外優秀的新聞作品，讓他山之石做為本土借鏡，透過精良的譯筆，讓國內實務新聞工作者，及有志入行的傳播科系學生，也能有見賢思齊的機會。

今日的新聞，有可能是明日的歷史。新聞記者想做第一線的歷史紀錄者，其作品品質的良窳，乃直接影響公眾耳目的清暗和善惡判斷。如果此一書系的出版，對台灣記者的專業品質、工作經驗累積、與工作成果發表能有貢獻，那我們的努力便沒有白費。

推薦序：日本有亞洲嗎？

地理名詞可能是抽象的，不具任何意義；例如說：亞洲、東亞、東北亞、東南亞，都是屬於概念上的地理名詞。抽象名詞一旦刻意注入流動的政治權力之後，鮮明的歷史意義與歷史記憶就會浮現。誰有能力使平面的地理名詞產生高度的政治意義？誰有權力在地圖上劃出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清楚界線？亞洲的定義原就無需定義，但是在權力支配之下，或是在帝國慾望的想像中，遂製造了許多歧義性的亞洲。

凡是走過戰爭年代的亞洲人，都不會忘記亞洲一詞所暗藏的中心與邊緣之間的權力關係。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所釀造出來的「脫亞論」，以及在發動大東亞戰爭前夜所鍛造的「興亞論」，在記憶裡始終牽動著亞洲人的敏銳情感。脫亞與興亞兩種論述裡的亞洲，絕對有其特定的政治傾向與文化意涵。脫亞，意味著刻意要掙脫落後的亞洲。興亞，則是要使可資利用的亞洲興起。前後兩種亞洲的定義，並非取決於亞洲人民的政治共識，而是單方面由日本的帝國意志來決定。何時必須掙脫亞洲，何時必須興起亞洲，也全然由日本的帝國慾望來裁決。

縱然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脫亞論與興亞論的思維方式，仍然還未在日本社會退潮。帝國的想像，依舊還是如幽靈那般，以不同的語言與不同的形式不斷回轉到日本人的思考。這種傾向在戰後日本的媒體表現得最為清楚，從報導到評論，足供窺見集體無意識潛藏的權力慾望。不經意的語言往往是內心世界最真實的表白，脫亞論與興亞論的思維模式，千絲萬縷地與戰後政治論述緊密聯繫起來。閱讀日本報紙，幾乎可以透視日本權力人物的思考深處之風吹草動。

卓南生教授的《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是觀察日本社會與閱讀日本媒體長達四十年所獲得的深刻見解。浩浩蕩蕩的文字，既具知識考掘

學的洞識能力，也具有揭露東方主義思維的批判精神。游走在他的文字之間，不僅是一種政治考察，而且也是一種歷史閱讀。在華人世界裡，能夠對日本政治發展提出即時而又細膩的評論，也許並不多見。至少在台灣社會內部，幾乎無法找到如此具有洞察能力的發言者。卓先生能夠完成一部結構緊湊的研究專書，絕非只是依賴他早期的留學經驗，當然也不只是求諸於每日的報紙閱讀。最主要是因為他是一位新加坡學者，致力於對整個東亞歷史的研究。長期處於東亞的邊緣位置，使他能夠對客觀形勢變化掌握全局的視野。更重要的是，他無法忘懷日本曾經在戰爭期間佔領新加坡的歷史記憶。正是強烈的歷史意識與政治警覺，驅使他挺起批判的筆。

從明治維新以降，一直橫跨整個二十世紀，日本始終壟斷亞洲一詞的解釋權。縱然經過慘痛的戰敗經驗，帝國之夢仍然還在持續燃燒。只要帝國火焰沒有熄滅，日本在想像中建構起來的亞洲圖像，就永遠與真實的亞洲劃開無法對話的鴻溝。卓先生的觀察之所以充滿說服力，就在於對每個事件議題背後，他能夠徹底揭露日本的亞洲想像之虛構。

他的思考方式，頗近於薩依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一書對西方殖民文化所展現的批判。薩依德指出，西方帝國在近代養育出來的殖民慾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歷史上建構起來的東方想像。在殖民論述裡，東方是沒有文明的，注定是永遠停留在惡性循環的歷史經驗。能夠使東方獲得救贖的唯一之道，就是祈求西方帝國施以援手。日本的脫亞與興亞論述正是西方帝國的東方想像之翻版。由於明治維新使日本優先抵達現代化的起跑點，遂自認為是先進的、文明的國家。在其殖民論述裡，日本有計畫地把現代化的優先性，轉化為文化的優越性，從而以上國的姿態凌駕於亞洲其他各國之上。

書中第一部份：「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便是致力於探討日本在戰前是如何建立南方或南洋的想像，以及在媒體報導中，如何進一步把南洋想像轉化為帝國權力的延伸。當日本以「救世主」的身段降臨南洋時，那種佔有慾的實踐，幾乎已到達西方帝國之東方想像的高度。卓先生更為精闢的論點，便是揭露日本媒體對亞洲政治的選擇報導。凡是有利於

帝國的開展，就可容許納入新聞報導的體制。遇到不利時，便採取視而不見的策略。

具有強烈批判的薩伊德，在《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書中，也同樣戳穿西方帝國的新聞製造。Cover 一詞，既有報導的意涵，但同時也有遮蔽的意味。薩伊德旨在提醒帝國權力者，西方媒體對中東伊斯蘭文化的報導越多，對真實的回教社會就遮蔽越多。這種媒體的性格，正好也在日本的亞洲報導獲得同樣的印證。卓先生研究的重要意義就在此彰顯出來，歷史上的日本從來就沒有意願面對真實的亞洲。他們寧可選擇想像的亞洲，並且依照自己的主觀願望量身訂造一個他們樂於擁抱的理想亞洲。正是這樣的思維方式，使日本媒體文化淪為不折不扣的新聞製造業。

書中的第二部分：「從亞洲看日本的變與不變」，與第三部分「日本與亞洲·世界的對話與溝通」，都是透過事件的發生，透視日本媒體的亞洲論述。無論是派兵海外或是爭取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都再三顯示日本雖然位在亞洲，卻從來不把自己視為亞洲的成員之一。從邊緣的角度看日本，終於不能不使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日本有亞洲嗎？

這個問題並非是孤立的。韓國學者白永瑞，延世大學的歷史系教授，曾經發表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有亞洲嗎？〉。白教授的質問極為犀利，充分顯示韓國知識份子的焦慮。面對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以大國崛起的姿態出現在亞洲版圖時，富有歷史記憶的韓國學者，不能不提出嚴肅的省思。飽受日本殖民與美國干涉歷史經驗的朝鮮半島，見證大國陰影從亞細亞大陸投射過來時，他不能不說出內心的真實感受。有一天，中國必然要積極介入亞洲的事務。如何避免重蹈日本殖民與美國干涉的歷史覆轍，就有必要對記憶中的傷害進行一次思考上的整理。

在這個意義上，卓南生教授的研究成果也許就不只是針對日本媒體文化。所謂亞洲，絕對不是意義單一的亞洲，更不是權力慾望之下的扁平化亞洲。在新世紀，為什麼亞洲各國對日本與美國仍然抱持高度警戒？為什麼過去的帝國對亞洲伸出正義之手時，都引發恐懼的記憶？凡是經歷過殖民經驗與後殖民經驗的亞洲人民，都會拿同樣的問題去質問北國的日本。

在亞洲內部，流動著複雜、繁瑣、重疊的歷史情緒，那是來自長期受到帝國欺罔、哄騙、壓榨、掠奪的歷程積累而成。懷抱著這樣的情緒，亞洲與日本之間看不見的緊張對抗就永遠存在。

承受殖民地記意的台灣，有多少知識份子如卓南生教授那樣認真閱讀日本？輕易放棄歷史意識，幾乎就等於是放棄國家的主體意識。以現代化一詞來取代日本殖民的記憶，從而對於帝國完全失去批判能力，似乎是台灣知識界最墮落也最衰弱的精神表現。閱讀卓教授的著作，絕對可以使台灣知識份子重新走過歷史的記憶，並且也喚醒喪失已久的自我意識。所有亞洲知識份子在閱讀日本之餘，也要認真閱讀自己，帝國的幽靈便不可能捲土重來。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陳芳明

2009年2月10日

自序：我在日本怎樣摸索新聞學的道路

「我們總算走上了留日的道路！」

40 多年前抵日後不久，在一份留學生刊物上看到了這樣的標題，令人感觸良深。對於上世紀 50 年代、60 年代最早的幾批亞洲留學生來說，要走上「留日」這條道路，並不是那麼容易。

首先，是戰爭的陰影猶存；其次，是各方對日本學術的評價及留日後的出路，與其說是正面和樂觀的，不如說是負面和悲觀的。

「到那神風敢死隊與憲兵隊的故鄉，到底能學些什麼？」

「日本的一切，充其量只是歐美的仿照。同樣是付出寶貴的青春到海外取經，為何不直接前往歐美？」

……

在獲悉我決定到日本留學時，幾乎周圍所有的師輩、親戚和朋友都異口同聲發出反對的聲音。

「戰後的日本有異於戰前，飽受戰火洗禮的日本人應該會更加珍惜和平。」

「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應該更爲實用。明治百年以來日本近代化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可以作爲我們的借鑑。」

「正因爲這是一條人們少走的道路，更具有挑戰性！」

……

不少與筆者同輩的留學生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踏上了「留日」的道路。不過，坦率地說，出國前師輩和親朋好友的勸阻，卻在筆者和同年代留日同學的心坎上深深地打下了幾個問號，並迫使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觀察與思考下列問題：

「戰後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別於戰前？」

「日本是怎樣看待亞洲的？」

「到日本，到底能學些什麼？」

正是抱著力圖探明上述問題真相的意識和態度（日本人所說的「問題意識」），不少與我前後期留日的同學都十分關注日本各個層面的動靜與變化，並通過不同形式（信件、聊談或向報刊投稿）向親友或國人報告他們在日本親歷其境的體驗。在有關日本的資訊還不那麼多的時代裏，這些一手的體驗記或來自日本的通訊稿，不失為人們瞭解日本的一個管道。

筆者是學習新聞學的。打從抵日第二年（1967年）開始，為了學以致用，便開始為新加坡的兩家中文日報《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兩報於1983年合併為《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簡稱《聯合早報》）寫通訊稿。於是，詳閱日本各家大報，便成了我每天的基本作業。1973年，筆者回國出任《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兼研究主任。在此之後的16年間，作為國際時評工作者，閱讀日本各家報章，從日本的「視窗」尋求中英文傳媒之外的不同資訊與日本輿論走向，更成為我工作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1989年轉入學界之後，日本媒體仍然是我接觸與研究的物件。

「日本人是怎樣看待亞洲的？」

「日本的大眾傳媒怎樣報導亞洲？」

「日本的亞洲觀與亞洲外交的基本論調與特徵是什麼？」

在過去的40多年裏，這些問題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裏。日本大眾傳媒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及日本的亞洲政策走向，遂成了我在撰寫評論與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戰前戰後有何差異？

正如前面所述，筆者是抱著「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的殷切心情與願望到日本學習的。但坦率而言，這一想法在我抵日後的第一個年頭，就已被證明是一廂情願和行不通的。不論是在大學校園裏和同學交談，還是與左鄰右舍的市民對話，筆者都深深感受到日本人對亞洲（特別是東南亞）關心程度之淡薄及知識之貧乏。至於一般知識份子的亞洲觀，不是停留於

空洞無物的觀念論（它具體地體現在當時流行於自由派的學者與學生當中），就是從戰前的亞洲論中求靈感。在上世紀 50、60 年代，由於戰爭結束不久，那些戰爭期間為配合「大東亞聖戰」而出版的刊物，在舊書店還堆積如山。在東京神保町的舊書店街，日幣 20 圓、50 圓的書比比皆是（當時一美元可兌換 360 日圓）。

翻翻上世紀 30、40 年代的出版物，再看看當時日本論壇上某些亞洲問題專家、學者的言論，不少亞洲青年不能不驚歎兩者的論調和思維之相似。20 世紀 60 年代日本財界一度甚囂塵上的「麻六甲生命線論」是一個例子；某些專家把「戰後的印尼」比喻為「戰前的滿蒙（滿洲和蒙古）」，大談「印尼是日本的生命線」是另一佳例。

不僅如此，為了協助官方與財界制止上世紀 60、70 年代東南亞的「反日」浪潮和改善日本的形象，日本的新老「東南亞通」們更傾巢而出，出謀獻策。特別是在 1972 年，在泰國學生由於不滿日本經濟勢力的長驅直入和不把泰人看在眼裏，而發動了為期十天的抵制日貨運動之後，日本的大眾傳媒與大批的專家、學者都被動員到當地「考察」和「調查」。1974 年 1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遭遇泰國和印尼學生的遊行抗議和暴動事件，上述報人、專家與學者更是急於開列各種旨在緩和雙方矛盾的「藥方」。¹ 如果將這些「東南亞通」與戰前和戰爭期間的「南洋通」或「宣撫官」² 相比，不難發現兩者有其共同之處：與其說

¹ 有關這一時期日本輿論界的動向，參看拙稿〈日本的亞洲研究熱——日本人為什麼令人討厭？〉和〈日本人為什麼不受歡迎？——且聽日本專家的新論調〉，收錄於《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全三卷）——「日本社會」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第 245-256 頁和第 56-69 頁。

² 日本在佔領亞洲各地之後，為了促使當地民眾「理解」日本和穩定人心，曾派遣大量從事「文化活動」的宣傳班人員，他們統稱為「宣撫官」。其中「從軍宣撫官」的主要任務是發佈「對敵宣言」、「歸來（指投降）勸告」、「收集情報」、「削除抗日（相關）的物件（指書刊、標語等）」、「展示親日物件」等。「定點（駐紮當地的）宣撫官」則從事於「救濟難民」、「獎勵推行日本語的普及活動」、「發行報紙」、「主辦演出、展覽」等。其目的是「安定民心」。詳情參看 [日] 青江舜二郎：《大日本軍宣撫官——一個（青年）青春的紀錄》，芙蓉書房，1970 年，第 190-191 頁。

他們是在認真檢討日本南進國策之是否失誤，不如說是旨在通過「文化力量」等手段達到「感化」對方的目的。戰後的「文化交流論」與戰前旨在掌握人心的糖衣炮彈——「文化工作論」最大的區別究竟何在？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

至於在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向我們提出下列問題：「新加坡人是不是也吃大米？」或者「你們對日本有何期待？」（典型的小國對大國的「期待論」）……這些提問既流露出日本人對亞洲的無知及潛在的優越感，也間接宣判了我們渴求的「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其實是一廂情願的美夢。

在研習新聞學的過程中，筆者也曾想過尋找一個有關日本與亞洲的研究題目來探討，但認真翻閱前人的研究書刊目錄，幾乎找不到一篇相近的研究論文。日本的新聞傳播學者是不是真的都與亞洲毫無交往而對亞洲毫不關心呢？我曾經存有這樣的疑問。不過，在翻閱師輩們的著作與戰前的記錄及經歷過諸多「文化震撼」之後，筆者得出如下的結論：日本的專家學者之所以與亞洲人難以坦誠溝通，僅僅歸因於戰後日本報界、學界的「脫亞」心態及他們對歐美文化的推崇，並不能說明所有的問題。

原來在當時學界與報界的圈子裏，有不少知名的新聞學者和新聞工作者是與「亞洲」有著深厚的淵源的。對於其中的某些人來說，「亞洲」簡直是他們的事業與人生生涯中永不能磨滅與遺忘的重要部分。在抵達東京向日本新聞學界取經的第一、二個年頭，筆者就遇到了這麼一位與「亞洲」密不可分，而令我迄今仍難以忘懷的人物……

東京拜師的文化衝擊

那年筆者從新加坡轉到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新聞學系，成為二年級的插班生時，就和日本的同學們一同選修了一門據說是非常著名的新聞工作者酒井寅吉老師的課——「現代新聞事業論」。這位老師究竟著名在哪裏？當時日語還似懂不懂的我不很清楚，只知道他曾經是《朝日新聞》的大牌記者及在新聞傳播學界頗有名氣的《綜合新聞事業》季刊當主編。

上完第一堂課，我和酒井先生打了個招呼。先生聽說我是來自新加坡的留學生，似乎感到有些突兀。他愣了一陣，然後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一

個躬，說了聲「對不起！」，即悄然離開課堂。

我一時轉不過來，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往後仔細打聽，才知道他是當年新加坡淪陷時，親自目睹並報導了有「馬來之虎」之稱的山下奉文將軍勸降英國白思華將軍，迫使後者在「Yes」與「No」之間作一抉擇的會談而馳名天下的《朝日新聞》「從軍記者」（即隨軍記者）。他曾在《大阪朝日新聞》夕刊連載長達 33 篇的〈馬來戰記〉，並「以其美麗的文筆博得百萬讀者的喝采」。酒井在回返日本之後還四處演說，介紹東南亞人對日軍熱烈的歡迎情景，成了當時報界的紅人與「演說記者」。

不難想像，作為「大東亞聖戰」的隨軍記者，酒井先生當時所寫的「戰記」報導及其「演說」有著怎樣的內容。問題是，在戰後，作為一名自稱頗有「反骨（造反）精神」的新聞工作者並被捲入「橫濱事件」³的酒井，到底怎樣看待自己戰爭時期的戰地報導，及如何總結與評價其「從軍記者」的作用與影響？很遺憾的是，在整整一個學期「現代新聞事業論」的授課中，我聽不到任何這方面的話題。

筆者是在 1942 年 4 月，也就是日軍於同年 2 月 15 日（農曆正月初一）攻陷新加坡並將之易名為「昭南島」的兩個月後誕生的。對於日軍佔領下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日子，我雖未留下什麼記憶，但孩提時從親歷其境的長輩的談話中，從小學時期同班同學喪失父兄、親人的具體例子裏，可以肯定日軍的南侵行為與「大檢證」⁴的屠殺事實是鐵證如山的。在日

³ 橫濱事件是指日本情報部門於 194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國內進行言論思想鎮壓而製造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當時共有 60 餘名知識份子因涉嫌所謂「參與共產主義活動」或具有支持敗北主義的傾向之罪名被捕入獄，著名的中央公論社和改造社等也被情報局命令解散。

⁴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軍機開始轟炸新加坡，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淪陷。從 2 月 18 日起一連三天，日本佔領軍在新加坡全島展開「大肅清」的活動。由於當時凡被審問而獲釋者皆被蓋上「檢證」二字，新加坡人稱此恐怖的大逮捕活動為「大檢證」。據 1942 年版《朝日東亞年報》之記錄，當時共有「70699 人被逮捕」。由於當時被逮捕後死裏逃生者少有所聞，估計死者不下五萬人。詳情參看 [新] 許雲樵、[新] 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文史出版社，1984 年。

軍侵佔新加坡時擔任「從軍記者」，高舉《朝日新聞》報旗衝入新加坡的樟宜監牢，比日本侵略軍還搶先一步「解放」被關於監牢的日本人的酒井先生，當時是怎樣記載這段史實的？他在戰後又是如何總結這段歷史的呢？在戰後的大學講壇上教授「現代新聞事業論」，強調要「客觀報導」與傳達真相的新聞學者，其內心的真正看法是什麼？我是非常感興趣的。

有一天，筆者在神田的舊書店看到了酒井先生戰後寫的〈馬來戰線從軍的回憶——抓住「轟動世界的特種類（新聞）」的昭南事件的記者〉的回憶錄。⁵ 閱畢不禁震驚不已。原因是口口聲聲強調「客觀報導」與傳達真相的新聞學老師，在戰爭結束已逾十餘載的 50 年代末期，對於自己美化戰爭的舊著《馬來戰記》，居然還持以「同樣的心情」。他寫道：「我並不存在著諸如對戰爭的『罪惡感』之類的心理壓力。」

從酒井先生的上述看法，以及他戰後一字不提「新加坡大檢證」事件，但卻緬懷其《馬來戰記》中歌頌亞洲人認同「相同膚色」的日本兵並視之為弟兄的內容這一態度，不難看出戰後的酒井先生對「大東亞戰爭」的基本態度依然停留在戰前和戰爭期間。

對此，筆者當時受到的「文化震撼」是巨大的。我曾想進一步瞭解當時的情況並與老師論理，但據說他已離開世間。酒井先生在課堂上遇到一個在他作為「從軍記者」紅得發紫的頂峰時期誕生的受害國青年，到底持以什麼心態？他見到我時，為何要鞠個躬並說聲「對不起」，對我來說，迄今仍然是一個謎。

如果說，酒井先生這名前「從軍記者」是我留日期間最早接觸的、與亞洲關係密切的新聞學者的話，在上世紀 60 年代末期與 70 年代初期我所接觸的著名新聞學者當中，與「亞洲」和「戰爭」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老師，尚有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殿木圭一教授和戰前任職於東京帝國大學新聞研究室（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前身）、戰後在立教大學任教的小山榮三教授。殿木教授在戰爭期間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日本共同社的前

⁵ 見日本《丸》，1959年2月號，第30-32頁。

身) 派往馬來半島, 小山教授在戰爭期間則著有《戰時宣傳論》, 是積極主張加強對亞洲佔領地展開「宣傳和言論對策」工作的著名新聞學者。殿木先生對留學生非常親切。我曾表示要研究有關日本佔領新加坡與馬來半島時期的新聞史, 他說那得去打聽是否有足夠的資料。一個星期後, 殿木老師告訴我這方面的資料已不存在, 建議我換個研究題目。在談及他在馬來半島的經歷時, 殿木老師談的都是一些輕鬆的話題。從他口中, 我從未聽到有關日軍統治馬來半島的真相及日軍當時的新聞方針和政策, 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趣聞。

在立教大學的研究生院上博士課時, 修小山榮三教授必修課的學生只有我一個人, 這些課大都是在大學附近的「喫茶店」(日式咖啡店) 上的。我曾多次表示想瞭解戰前日本思想界和輿論界的狀態及他對其戰前著作的看法, 但都被引到其他「開朗」的話題並提前下課。

從殿木教授和小山教授的反應中, 我知道, 要從與戰前的「亞洲」及「戰爭」關係頗深的日本新聞學者口中獲得相關的資訊, 是不可能的。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政治土壤與氣候, 戰前、戰時日本「從軍記者」、「報導員」的「戰記」及當時新聞理論家們的輿論宣傳活動和理論, 在戰後也原封不動, 而未受到應有的反思和「檢證」(驗證)。

這樣的情況當然不僅僅發生在殿木和小山身上。就我所知, 在戰後的日本新聞傳播學界, 不少頗有名氣的學者也有著類似的情況。其中包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第二任所長千葉雄次郎教授和慶應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米山桂三教授。千葉教授在戰爭期間是《朝日新聞》東京本社編集局次長兼(南方)前線局長, 曾到「南方」巡視, 並主張對「南方」加強「文化工作」。米山教授在戰爭期間與前述的小山榮三齊名, 著有《思想鬥爭和宣傳》等旨在加強日本的輿論宣傳活動的著作。⁶ 他們在戰後日本新聞傳播學界各佔有一定的學術地位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他們戰後的新聞學

⁶ [日] 生田正輝：《米山桂三博士還曆紀念論文集 日本社會與近代化》，慶應通信，1967年，第593頁。

術研究活動中，對於其戰前、戰時的活動，同樣都隻字不提而留下「空白」。

由此可見，日本戰後的新聞界與新聞學界和戰前似乎沒有「連續性」，但實際上卻是有「連續性」的。

戰後的「脫亞論」與「興亞論」

當然，對於戰前與自己結下不解之緣的「亞洲」與「戰爭」，戰後一直保持沉默，儼然擺出與自己毫不相關姿態的，並不僅是前述知名的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者。認真而言，他們只是戰後日本文化界的一個縮影罷了。筆者作為來自赤道、一度被改名為「昭南島」的新加坡的青年，對於諸如戰爭期間被當局徵用為「南方文化人」的詩人神保光太郎、著名作家井伏鱒二等人士抵達新加坡後，究竟從事了什麼樣的「文化活動」，他們戰後又對自己的這些「文化活動」如何總結和評價等問題，當時是十分關心的。筆者也曾和他們當中的個別人士接觸，但有關的真實情況皆未得要領。

尤其令筆者感到驚訝的是，上世紀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初期曾積極從事日中邦交正常化活動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中島健藏，在戰爭期間也曾被徵用至新加坡，但他對這段往事同樣採取回避的態度。原來，中島是當時「日本語普及運動宣言」的起草者。該宣言的目的在於向「天皇陛下（統治）的新赤膽之心」的「馬來及蘇門答臘的島民」，提倡學習「正確而美麗的日本語」。

中島在當時起草有關宣言，也許有其難言之隱。但在戰後，特別是像他這樣一位以「自由開明派」姿態出現、積極從事日中友好運動的知識份子，對這段歷史顯然是有交待清楚和予以總結的必要。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正如一名長期從事日本與亞洲交流活動的日本朋友所指出一般，中島對此黑暗時代的真相並未留下應該留下的記錄。⁷

⁷ [日] 田中宏：〈中島健藏氏的《我的中國》讀後感〉，《中日新聞》夕刊，1973 年 3 月 3 日。